

SN 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方 笈

上

选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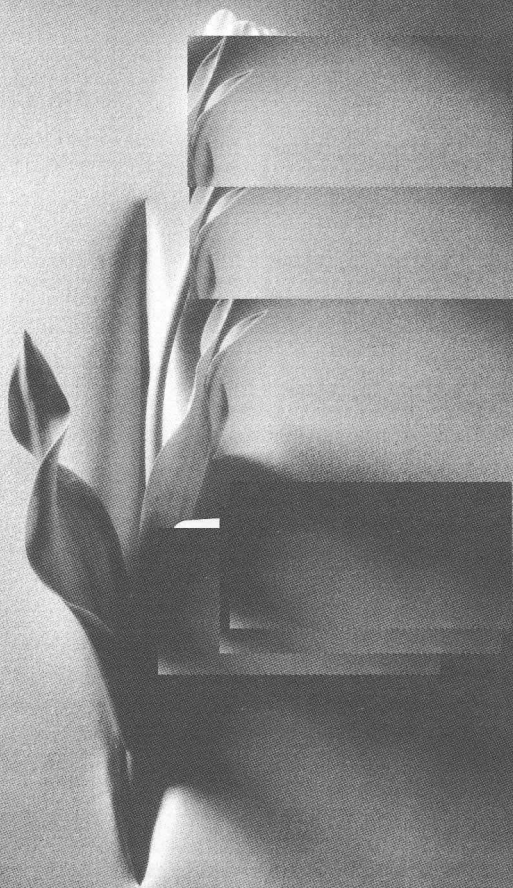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散文书系·古代部分

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

方

苞散文选集

王沛霖 王朝晖 选注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方苞散文选集/王沛霖, 王朝晖选注.—3 版.—
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百花散文书系.古代部分)
ISBN 978—7—5306—5406—4

I. 方... II. ①王...②王... III. 古典散文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I 264.9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630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18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一、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。它和诗歌一样，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。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，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，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，特编辑这套“中国古代散文丛书”，作为“百花散文书系”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。

二、散文文体范围，代有嬗变，古今不同。本丛书所选，以抒情、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。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，下迄于清代。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。各书篇目排次，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，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、演变轨迹。

三、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：一为论文，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、文学活动外，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，分析、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、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。一为散文，每篇均附加题解、注释。

四、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，以论文帮助

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,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,两相印证,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,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,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,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。

五、每书所选散文,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,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、不同题材、风格的文学性散文,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。

六、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、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、出处、版本等外,还对作品写作背景、思想价值、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,加以简明的评述。

七、注释以疏解难字、难词以及典故、职官、器物、人名、地名等为主。对其重要者、用法特殊者,并援引出处或例句,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方苞和他的散文

王沛霖 王朝晖

方苞生于清康熙七年(1668)夏四月十五日。字凤九,一字灵皋。晚年自号望溪,学者称望溪先生。安庆府桐城县(今安徽省桐城县)人。幼时就聪慧过人。五岁,父仲舒即口授经文章句。十岁时,随兄百川刻苦读经书古文,常请讲解疑难。二十二岁,岁试第一,补桐城县学弟子员(即秀才)。康熙三十年(1691),年二十四,入京师,游太学。安溪李光地见先生文叹曰:“韩、欧复出,北宋后无此作也!”长洲韩荃,文名海内,评先生文曰:“庐陵(指欧阳修)无此深厚,南丰(指曾巩)无此雄直,岂非昌黎(韩愈)后一人乎?”康熙三十八年(1699),年三十二,举江南乡试第一。翌年赴京师,应礼部试,不第,四月南归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春,复至京师,再试礼部又不第。但得与蠡县李塨刚主交游,共同讨论格物。康熙四十五年(1706),年三十九,春,又赴京师,再应礼部试,得中进士,

名列第四。将及殿试，朝论翕然，皆以先生当推第一。先生忽闻母病，即匆匆返回江南侍候母病，竟未应试。

康熙五十年(1711)，左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《南山集·子遗录》有悖逆之语，辞连先生族祖方孝标。戴名世与先生同县，亦工为古文，先生曾为其文集作序，因受牵连，被逮下江宁(今南京市江宁县)县狱，旋解送京师，下刑部狱。康熙五十二年(1713)狱决，戴名世坐斩，方孝标已前死，戍其子登峰等，先生及诸与此案有牵连者，皆免罪入旗籍汉军。康熙帝素知先生深于文学，大学士李光地也大力推荐，帝乃硃书“戴名世案内方苞，学问天下莫不闻。下武英殿总管和素”。翌日，召入南书房。数日中，帝相次命撰《湖南洞苗归化碑文》、《黄钟为万事根本论》、《时和年丰庆祝赋》。每奏进一文，康熙帝辄嘉赏再三，曰：“此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，不能过也。”命以白衣入直南书房。是年秋八月，移直蒙养斋，编校御制乐律、历算诸书，与徐蝶园同修乐律。

康熙帝命先生与诸皇子游处，自诚亲王以下皆呼曰“先生”。其时诚亲王权势炽热，性情严直，其下执事人等多被呵责，无不低首下心，唯命是听。惟先生刚直不阿，遇事持正争执。诚亲王极敬重之，并延请为王子师。

康熙六十一年(1722)，命先生充武英殿修书总裁。雍正帝即位，赦先生及入旗籍的族人尽归原籍。在雍正朝的十数年间，先生先后被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，迁翰林院侍讲学士，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命教习庶吉士，充《一统志》馆总裁、《皇清文颖》馆副总裁。

乾隆元年(1736)春，再命入南书房，命充《三礼义疏》

馆副总裁，乃上《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》，又奏请出秘府《永乐大典》录取宋、元人经说。秋七月，删定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二书。二年（1737）夏六月，擢礼部右侍郎，诏免随班趋走，许数日一赴部，平决大事。十二月复以老病请解侍郎任。诏许之，仍带原衔食俸教习庶吉士。四年（1739）春，命充经史馆总裁。夏五月，翰林院庶常馆散馆（指在庶常馆学习之庶吉士，三年学习期满，应经考试，视其成绩优劣分配官职）。有庶吉士吴乔龄后至，先生补请其参加考试。忌恨先生的人提出弹劾，说其中有私。先生便被削去侍郎衔，但仍命在三礼馆修书。

乾隆七年（1742），先生以时患疾痛，乞解书局，回籍调理。乾隆帝许之，赐翰林院侍讲衔。四月出都归里，杜门著书，不接宾客。偶尔寻医浙东，作天姥、雁荡之游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八月十八日卒。终年八十有二。

先生身修长，貌清癯，面颊微有痘斑，目光炯炯，视人如电，胆怯者见之，常顫顫不能语。为人敦厚和善，言动必守礼法，不逾常轨。待兄弟甚友爱，事父母极孝敬。其父仲舒公尝言：“吾体未痛，二子已觉之；吾心未动，二子已知之。”康熙五十年以《南山集》案牵连下狱，母老多病，并有心悸之疾。先生恐老母受惊，不敢吐露实情，给以安溪李公荐入内廷校勘，不得稽留晷刻，遂拜辞上路。及《南山集》案结，先生入直南书房，居赐第，迎母北上，其母竟然不知其子有下狱之事。先生为人廉洁，不苟受人货财。祭田租谷若有赢餘，则用之以贍合族；生徒馈赠，则予姻戚之贫者。不骄人傲物，平等待人，虽雇工仆役亦敬爱之。见一善事，闻一善言，辄反躬自问，愧未能行。如

有所规过，则诚心接受，终生铭记。长洲何纪瞻对于古文，所论与先生不合，纪瞻又好诋人短，朋辈多苦之，先生独喜闻其言，常用以反躬自省。

先生性刚直，不逢迎权贵，不冤屈好人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冬十二月，以刑部侍郎为顺天府尹孙嘉淦不为某亲王所喜，某亲王派人来见先生，授意急劾奏之，并许以先生代替孙嘉淦的职务，先生坚决予以拒绝。来说：“如果不从，祸将及身。”先生面临如此威胁利诱，仍然以死相拒。不久，孙嘉淦竟被诬以贪赃枉法被捕下狱。先生走访相国鄂尔泰说：“孙侍郎以非罪死，公复何颜坐中堂！”鄂尔泰因以百口保孙嘉淦，孙始得幸免于难。

先生好面折人过，不留情面，因此，往往与朝中同事不合，甚至有忌恨、排挤之者。故先生晚年所奏札子，下六部九卿议论，众皆合口梗之，甚至有人出来和他为难、弹劾他。一次，吏部欲挑选祭酒（国子监祭酒，国家教育管理机构 and 最高学府的主管官），乾隆帝沉吟道：“是官应使方苞为之，方称其任。”左右众人无一应者。乾隆四年五月被削去礼部侍郎衔，也是被忌恨者诬陷、攻击所致。

先生在职期间，爱国爱民，忠公守职。先后与相国蒋廷锡、张廷玉、鄂尔泰等论征伐、制驭准噶尔泽旺事宜；多次上疏朝廷要求推迟向农民征收地丁银两日期，以减轻农民困苦；希望制定常平仓谷的糴粬办法，以便及时拯救灾民，避免贪赃枉法弊病；祈求恢复河南漕运，以利黄河以南五十州县的经济的发展；要求及早备荒，并提出以工代赈办法；建言因民生日匮，菽米不足，请禁烧酒，禁种烟草，禁谷米出洋；请求国家矫除积习，兴起人才，为朝廷所

用……等等。所有这些都是有关系计民生的大事或振兴国家的关键性问题,先生能密切注意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,足见先生之体察民情、关心政事,希望国家政治清明、人民安居乐业之意。

先生性聪敏,四岁即能属对。一日,其父鸡鸣起身,值天大雾,乘兴口占一联云:“鸡声隔雾”,命先生接对。先生应声对道:“云气成龙。”对联是比较工整的。五岁,由父亲口授经文章句。七岁时,一日,乘父亲外出,与兄百川共启其父固藏祖传旧版《史记》潜读之,爱不释手。后来先生于《史记》多有所得,即此发其端绪。十岁,随兄百川读经书古文,百川为讲经书注疏大全,择其是,辨其疑,相与博究经史百家之书。十一二岁时,对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诸书都能背诵。二十岁后,循览《五经注疏大全》、通志堂《宋元经解》,遍读唐宋以来诂经之书,作《读尚书偶笔》、《读易偶笔》、《朱子诗义补正》。康熙三十年(1691),先生入京师,经学家万斯同降齿德与之交。在万先生影响下,先生于是辍古文之学,一意讲求经义,开始读宋儒之书。故先生与姜宸英、王昆绳等自论行身祈向,曰:“学行继程、朱之后,文章在韩、欧之间。”

先生在刑部狱中,悉心研究《礼记》,入直南书房后,于康熙五十五年著成《春秋通论》。其后供事书局,公事之暇,辄致力于《春秋》、《周官》,前后几三十年。康熙五十九年著《周官集注》成,翌年著《周官析疑》成。乾隆元年充《三礼义疏》馆副总裁,乃拟定纂修条例,上疏请鉴定施行,对三《礼》也全面进行了研究。

先生幼儿时即能属对，青年时所交多楚越遗民，重在文藻，耳濡目染，默化潜移。又其父仲舒与钱澄之、杜苍略诸先生交游，常以诗唱和，先生爱其铿锵、抑扬顿挫，亦欲仿效为之。其父告诫他说：“毋以为也。是虽小道，非尽心以终世，不能企其成，而耗少壮有用之心力，非躬自薄乎？”因此先生就绝意不在诗歌方面用心了。今《望溪先生文集》中诗歌绝少，也不见得出色，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。

先生于十岁时开始学作时文，即八股文，前辈见而异之。杜苍略见其《读孟子》文，评曰：“前儒所未发，却妇人小子所共知。”礼部尚书韩文懿公荃评其时文曰：“义理则取熔六籍，气格则方驾韩、欧。”进士张彝叹评曰：“探孔、孟、程、朱之心，撷左、马、韩、欧之韵，天生神物，非一代之珍玩也。”乾隆元年，帝亦认为先生工于时文，命选明代及本朝诸大家四书制艺（即八股文）数百篇颁布天下，以为举业准的。先生于乾隆四年选成，奉命颁行天下。然而先生始终认为时文“尤术之浅者也”。他说，古之圣贤有高深的思想修养，所作所为，对人们是很大的功业，所以史臣记录下他们的事业，学者传流着他们的言论，并奉以为经典，与天地流传不朽；次一等的，如左丘明、司马迁、班固，能通古今之变，存一王之法，所以他们的记事之文传；荀卿、董仲舒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，以待后之学者发扬光大，所以他们的道古之文传；管夷吾、贾谊之流，畅晓治国安邦的事务，所以他们的论事之文传。这些人都不是故意要写文章流传后世的。韩愈、欧阳修写了很多文章，也不是想当一个文学家，所以他们的文章规模宏大，

无人能及。南宋以后，作者皆欲仿效前人，唯恐不似，用框框把自己框起来，文章哪能不文笔滞涩、气度狭小呢？至于明清的时文，尤其是一种格调低下的文体，它束缚人们的思想，于世无补，不宜提倡（参见《杨干木文稿序》）。在时文是科举考试的国颁标准文体的当时，先生敢于提出这样大胆的意见，没有一点气魄是不可能的，而先生的这一意见是中肯的、极有价值的。

先生所提倡的是古文。他论古文，必曰“义法”。他说：

春秋之制义法，自太史公发之，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。“义”，即《易》之所谓“言有物”也；“法”，即《易》之所谓“言有序”也。义以为经而法纬之，然后为成体之文。（《又书货殖传后》）

由此可见，先生论文章，不尚空言义理，不使流于抽象空疏，而要求言之有物，要求要有实际的社会内容；另一方面，文章所言的义理，意在为人们所理解，为社会所实用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不能语无伦次、杂乱无章，而要言之有序，即要求文章要讲究好的表现方法。“义”即指的是文章的思想内容，“法”即文章的表现形式。所谓“义以为经而法纬之”，就是要求文章要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高度统一。

先生所主张的“义”的主要内容，不外是儒家所讲的纲常大道，即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伦理道德。他说：

若古文，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，非中有所不得可以为伪。韩子有言：“行之乎仁义之途，游之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源。”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，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。（《答申谦居书》）

盖古文所从来远矣。六经、《语》（《论语》）、《孟》（《孟子》），其根源也。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，莫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……，其次《公羊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……。唯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，篇各一事，可择其尤而取至约，然后义法之精可见。……学者能切究于此，而以求《左》、《史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、《语》、《策》之义法，则触类而通。因是以求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旨而得其所归，躬蹈仁义，自勉于忠孝，则立德立功，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才之至意者，皆始基于此。（《古文约选序例》）

这些都说明了先生坚持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以明道”之说，认为文章本源于儒家经典，应以儒家的道义，特别是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道，《春秋》之义为根柢。所以《望溪文集》中到处流露着对忠、孝、仁、爱的歌颂，对贞女烈妇的赞扬。其所表现的这些封建伦理思想，其本质当然是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，所以是并不足取的，是应该批判的。然而望溪先生的义法理论，就其文学创作必须言之有物的主张，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具有真实的社会内容，必须为社会服务这一点说，无疑是可取的。

望溪先生古文中反映的思想，除封建道统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纲常、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外，

尚有其他一些思想。首先是民族主义思想。清王朝以满族入主中国,不仅对汉民族的反满行动实行无情镇压,即是对反满思想情绪也是非常警惕、戒备的。特别是知识分子之言论、文字,更加注意,稍有违碍、不敬,就要加之以刑戮,所以大兴文字之狱。望溪先生就亲身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的文字狱。出狱以后数十年,心中时有餘悸。然而他的民族意识虽然微弱,但是始终未能泯灭,若隐若现地反应在文集中。如念念不忘明遗民的民族气节。《田间先生墓表》说:

先生形貌伟然,以经济自负,常思冒危难以立功名。及归自闽中,遂杜足田间,治诸经,课耕以自给。……先君子闲居,每好言诸前辈志节之盛,以示苞兄弟。

田间先生姓钱名澄之,生于明朝末年,所谓“冒危难以立功名”,所谓“志节”,所谓“杜足”“课耕”,难道不是民族思想的体现吗?

先生还歌颂黄道周英武不屈的气节。黄道周为明天启进士,明福王时官礼部尚书,唐王时为武英殿大学士,以抗清兵失败而死。先生描写他被关押在监狱中及就义前的坦荡胸怀,从容不迫,表现先生心中的敬仰之情:

及明亡,公繫于金陵。在狱,日诵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,数月貌加丰。正命之前夕,有老仆持针线向公而泣,曰:“是我侍主之终事也。”公曰:“吾正命而毙,

是为考终，汝何哀？”故人持酒肉与诀，饮啖如平时。酣寝达旦，起盥漱、更衣，谓仆某曰：“曩某以卷索书，吾既许之，言不可旷也。”和墨伸纸，作小楷，次行书。幅甚长，乃以大字竟之，加印章，始出就刑。（《石斋黄公逸事》）

写明朝兵部尚书、大学士孙承宗每天吃糙米饭共历十九年的事，表现孙承宗的远见卓识，赞扬他合智谋忠勇之士以尽其材，用危困疮痍之卒以致其武。把他比作汉代的诸葛武侯，反映先生对抗清名将的景慕。（参阅《高阳孙文正公逸事》）

望溪先生文章还揭发了政治的黑暗，官吏结党营私、漠视人民疾苦，权势之家的危害人民等问题。如《狱中杂记》揭露了监狱随意钩致无辜的人入狱，因为这样可以有办法勒索囚犯的财物；又为了勒索财物，所有行刑的狱吏都要滥施毒刑；还有骇人听闻的偷梁换柱的情形，把不该处罚的人拿去顶替重罪的人处死。至于揭露权臣结党营私的，如康熙二十三年，在开海口工程中，相国、河督、工程指挥之间，各结私党，互相掣肘，互相倾轧，诡施妙技，巧取国库银两私分。（见《记开海口始末》）至其揭露权势之家侵害人民的，如《陈驭虚墓志铭》云：

少好方（医术），无所不通，而独以治疫为名。……诸势家敦迫之使廩至，使者稽首阶下。君伏几呻吟，固却之。退而嘻曰：“若生，有害于人；死，有益于人，吾何视为？”

陈驭虚对仗势害人的人的办法,使人觉得痛快,不能用一般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去要求。先生揭露官吏漠视人民疾苦的如《逆旅小子》:

逆旅小子形苦羸,敝布单衣,不袜不履,而主人挞击之甚猛,泣甚悲。叩之东西家,曰:“是其兄之孤也。有田一区,畜产什器粗具,恐孺子长而与之分,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;夜则闭之户外,严风起,弗活矣。”余至京师,再书告京兆尹,宜檄县捕诘,……孺子果以是冬死,而某亦暴死,其妻子、田宅、畜物皆为他人有矣。叩以“吏曾呵诘乎”?则未也。

康熙时期,史称盛世,但是其官吏却视民命如草芥,可见其吏治仍然很黑暗。

先生揭露这些弊政,也是希望政治清明,国强民安。所以他还提倡选贤任能,以整肃封建统治秩序。他说:

监司之体,在辨属吏之清浊,而迹来廉辨敏肃者,尤当观其所由,以为义之所宜,心之所不安而然者,必能明政恤民,久而不变。……位者天位,职者天职,其贤者能者,虽有憎怨,必释吾憾而任举之,其不为民所赖者,虽吾近亲尊属,必斥而去之。壹以官为准,壹以人为衡,吾之爱憎喜怒,无几微可杂于其间。(与《陈密旃书》)

先生不但口头这样说，而且行动上也这样做了。有这样一个事例：

往者，安溪李文贞巡抚畿内，仆有亲故为属吏，公将擢之，仆力言其非人。河间王振声曰：“子与夫人终不相见乎？”仆曰：“何为其然。使无播恶于众而自驱于罟擗陷阱之中，乃所安全而爱厚之。”（《与陈密旃书》）

望溪先生所主张的义法，其在“法”方面的主要内容为：

一曰内容简洁。要求选材精当，芟刈繁芜，达到精炼雅洁的境界。先生论选材有云：

《萧相国世家》所叙实绩仅四事，其定汉家律令及受遗命辅惠帝皆略焉。盖收秦律令图书、举韩信、镇辅关中三者，乃鄂君所谓万世之功也。其终也举曹参以自代而无少芥蒂，则至忠体国可见矣。至其所以自免，皆自他人发之，非智不足也，使何自觉之，则于至忠体国之道有伤矣。故终载请上林空地械系廷尉，明何用诸客之谋，非得已耳。若定律令，则别见曹参、张苍传。何之终，惠帝临问而举参，则受遗命不待言矣。盖是二者，于何为顺且易，非万世之功比也。（《书萧相国世家后》）

文中所论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所叙萧何平生业绩，仅举